

谈艺现象

深度对话,解读现象

记者:2021年9月,由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共同组织撰写的《人民英雄——国家记忆文库》,第一辑6册已经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这套文库一出版就受到读者关注,在建党一百周年的特殊时间节点推出,有着怎样的考虑?

侯健飞(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教授):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我们尤其不能忘记为人民利益和民族前途浴血奋斗、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革命历史在新时代延伸,先烈们的奋斗精神激励我们砥砺前行。英雄是文学的富矿,也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习近平主席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眼纳千江水、胸起百万兵,把握历史进程和时代大势,反映中华民族的千年巨变,揭示百年中国的人间正道,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唱响昂扬的时代主旋律。”作为军旅作家,同时也是从事军旅文学教育的教员,我越发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当代军旅文学有其鲜明的个性和无可替代性,因为它是在血与火的淬炼中形成和发展的,是家国情怀与强军精神的共同体。我所在的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前身是解放军艺术学院,从20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军旅作家,创作出了许多引领时代风尚、闪耀经典光芒的军旅文学精品力作。如何以文学教育和文学创作的方式更好地传承红色基因,通过优秀的军旅文学作品引导学员和部队官兵更好地担当强军重任是我们肩负的使命职责。长久以来,我心底一直酝酿着一个夙愿,那就是以国家级烈士纪念馆为主要载体和资源,进行革命英雄主题性的文学创作;让今天的部队官兵和青少年们更真切、直观地了解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了解革命先烈的的事迹和精神;我们有必要、有责任给新时代的部队官兵和青少年讲好革命先烈的故事,讲清顽强奋斗、英勇牺牲的内在逻辑和价值意义。

徐惠冬(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军事文艺创作系主任):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作为这套文库的主要发起者和组织方,近年来,紧扣“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这个主题,持续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教学和创作实践;随着党史学习教育活动的持续深入,军事文艺创作系有计划地组织师生去纪念馆、烈士陵园参观学习,回来以后扎实开展主题性创作。建党百年前夕,军事文艺创作系党委把组织创作《人民英雄——国家记忆文库》作为实践教学和科研专项工程上报,军事文化学院党委对这个项目高度重视、大力支持。

我们和中国青年出版社一道,做了大量前期准备工作:约请、组织学院师生、校友和相关作家围绕特定人物和题材实地探访、扎实采访、研讨交流、擦亮创作、反复打磨,收获了一批吸引人、感动人的好作品。那些积淀历史的文物和饱经沧桑的图片,蕴藏着众多动人心弦的红色故事,让师生们的内心深受震撼,创作灵感得到激发。这种主题性的教学和实践教育活动,既是对师生们进行革命历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路径,也是对学院优秀教学传统和创作成果的继承与展示。

李师东(中国青年出版社总经理):中国青年出版社有着红色出版的光荣传统,在新时代,怎样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文化,把革命先烈的故事用青少年读者乐于接受的方式进行呈现和表达,这是我们思考和努力的重点。从文化出版的角度用好、用活珍贵的革命文物和图片:从历史现场出发,充分运用纪念馆的文物资料,有历史感、有现场感地讲述革命先烈可歌可泣的故事,这是新时代出版工作者亟待回应的时代课题。

明确了创作主题和出版主旨后,就是组织驻地作家分头采访创作,用纪念馆及其珍藏的文物图片、文献资料,还原历史现场,讲好革命先烈故事。《人民英雄——国家记忆文库》第一辑为人物卷,主要讲述革命先烈的故事。目前已推出《吉鸿昌:恨不抗日死》《杨靖宇:白山忠魂》《刘胡兰: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雷锋:毛主席的好战士》《王进喜:我为祖国献石油》《谷文昌:只为百姓梦圆》6种,其余作品将陆续推出。

记者:中国当代军旅文学有着塑造英雄形象、建构英雄话语、弘扬英雄精神的光荣传统。进入新时代,英雄叙事既要守正,亦要创新,文库在这方面做出了哪些有益的尝试?

徐怀中(著名军旅作家):2019年底,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中国青年出版社联合发起大型图书创作出版工程《人民英雄——国家记忆文库》,致敬先烈,献礼党的百年华诞,我得知后感到很欣慰。英雄叙事就是要守住这个“正”字,理直气壮地扎牢自己的根,旗帜鲜明地张扬自己的魂。文库的创作出版可谓正当其时,为培养新时代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

礼赞人民英雄 铭刻国家记忆

关于《人民英雄——国家记忆文库》的对话

本报记者 傅强



班人培根铸魂,为担当复兴大任的青年一代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

李师东:英雄叙事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英雄之所以是英雄,就在于英雄的事迹本身和精神内核是经得起时间考验和历史阅读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有条件更客观、更全面地看待英雄,更能理解英雄事迹的可贵和内在的精神价值。这就需要我们将合新的时代特点,不断去激活、擦亮、创新,使之真正成为我们取之不竭的宝贵财富和精神资源。

进入新时代,实现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更需要英雄精神的激励和鼓舞、启迪和引领。我们推出这套文库,就是要以民族复兴的崭新视野和思想高度,不断创新英雄叙事的话语方式和表达形式,让部队官兵和青少年读者更容易受熏陶、受感染,让英雄更可感、可亲、可敬、可学,让英雄的精神魅力更加光彩夺目。

记者:文库中的英雄人物,对于年轻的受众尤其是青少年读者来说,或许是既熟悉又陌生的。熟悉的是那一个个闪亮的名字,从小到大无论是在课本还是在各种媒体中,都会不时遇到;陌生的是那些高大又似乎遥远的人物,他们的生命、经验、壮举与当下的现实生活,与每一个读者的生命和情感需要更加紧密的关联、对接。这就对作家们的写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能够做到穿越时空的阻隔,让这些英雄故事照亮当下读者的内心与情感呢?

胡月(《雷锋:毛主席的好战士》作者):雷锋牺牲的时候,我的父亲还没有出生,让我这一代甚至是更年轻的下一代来体悟、感受雷锋,我认为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如何理解那个年代,理解那个年代的人和事。毕竟,时代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通过反复查阅有关雷锋的大量资料,我发现,那个时代的表达大都是简

短而“热烈”的。这给了我一个提示,雷锋牺牲的时候,他比现在的我还要小10岁,那么,这本写雷锋的书应该有着同主人公一样的年轻和朝气。至少在语言调性上,应该是充满对这个世界的期待和希望,饱含憧憬与力量感,这也恰好符合雷锋的真实性格。

雷锋在我的生活中魂牵梦萦。晚上,我还会做有关雷锋的梦。在那些梦境里,我仿佛跨越了时空阻隔,站在雷锋身边,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有时还能跟他搭话。在梦里,我真正闯入了那个年代。这种体验让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何不用这种体验式的、沉浸式的手法去书写呢。用现在的视角,去发现、体悟那个年轻的生命,重现那段无限延伸的民族记忆。捕捉、认知、理解雷锋头脑中的逻辑和动因,是我一直想渗透和破解的;通过对这种逻辑和动因的梳理,贴近、模仿他的做事方式,是我学习雷锋、书写雷锋,进而融入雷锋的重要方式。希望我的文字,能让读者感受到蕴含其中的真情,继而以雷锋的方式重新认知和感受生活。

杨怡(《方志敏:可爱的中国》作者):2020年5月,我开始和徐贵祥老师合作写方志敏。在我的家乡上饶,方志敏的故事遍地都是。但要写好英雄,不仅需要文笔流畅,还需要你对这个人物的了解要深入他的灵魂。我想到艰难岁月里,文章、话剧都是方志敏最喜欢的宣讲革命的方式;又看到眼前可爱的中国,今昔对照间,思路渐渐形成。在写作之前,我为方志敏故乡湖塘村的村民们创作了一部以方志敏为原型的话剧《时空对话》,还组织了20位村民进行话剧排练,用2个月的时间,打造起一个纯粹由村民组成的民间话剧团。

为了向英雄的人格和精神靠拢,我觉得我先要做点什么,然后才能写点什么。也就是从帮助组建村民话剧团开始,方志敏的面貌在我脑海里逐渐清晰。农民们排练话剧的声音,方志敏写下狱中稿时深夜的咳嗽声……所有的声音在我的脑海里汇聚成深沉的回响。那个年代革命者的样子,我虽无法亲眼看到,但是在我的心中已然真切地矗立起来了。

记者:这套文库的核心主题或者说一大亮点,实际上在书名中已经旗帜鲜明地彰显出来了,那就是“人民英雄”和“国家记忆”。在已出版的6部作品中,无论是书写革命战争历史中的英雄传奇,还是塑造和平建设时期的英雄形象,都着力挖掘和梳理英雄叙事的人根性,牢固树立国家立场,强化民族集体记忆,这样的策划思路和写作理论使得文库既保持了庄重大气整体面貌,又有着贴近当下读者的生动好读的风格。

徐怀中:你分析评价得很准确。这套文库,用文学的方式回溯党史、军史,十分可贵,这是对我们伟大的党的讴歌和礼赞。“中青社”是红色出版的重要阵地,我青年时期创作的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最初就是由他们出版的。这一次军地联合行动,成果丰硕,随着后续作品的推出,更多先烈的英雄事迹将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讲好英雄故事,弘扬英雄精神,重点在“讲”,难点在“讲好”,关键是“弘扬”。大规模组织作家书写英雄、讴歌英雄,这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一次有益探索。参与此次创作的有不少是军内外知名作家,他们怀着对革命英烈最真挚的感情,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种种困难,不辞辛劳,深入革命纪念馆、烈士陵园采访调查,多方搜集素材,反复打磨,精心创作,体现出文学工作者的优良传统和过硬作风。作为一个年过九旬的老党员、老战士、老作家,我对很多英烈的事迹都很熟悉,但阅读了作品后,依然心潮澎湃,感动不已。这些作品思想性、文学性、故事性、可读性强,既写出了英烈的光辉故事,也写出了英烈精神的传承故事,独具匠心;同时,很多作品充分利用纪念馆和相关文物,在物中见人见事见精神,在人、事、精神中见物,相得益彰;历史感、现场感强,让英雄人物和他们的精神品格在文学叙述中真正活了起来。

侯健飞:党的十八大以来,烈士褒扬工作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全社会崇尚英雄、缅怀先烈的氛围日益浓厚。回顾历史,书写英雄,我们既要守正,也要创新。这套丛书的一大亮点就是把英雄当作大写的、立体的人来研究,把英雄的生命存在与时代精神紧密结合起来,通过英烈遗物和重新发掘出的历史细节,把英雄的精神贯通起来。人故去了,但精神是活着的,这话的精神又是通过英雄的亲人、战友以及人们崇尚英雄的言行来延续的。文库出版以来之所以能收获广大读者的广泛好评,恰恰印证了英雄叙事的特质与魅力。

进入新时代,军旅文学创作教学更加注重实践和创新。学院始终强调政治站位,教育引导文学后备军倾情创作传承红色基因、讴歌强军实践、军味浓厚的强军文学作品;不断探索教学模式转型,坚持把课堂一端延伸到史诗般的革命历史中,另一端延伸到火热的军营生活中,在历史与现实的对接和融合中达成教学成果的展示和转化。这套文库的首批20位作者中有很多是学院的师生和校友,他们自觉集结在英雄叙事的崇高主题下,这也是新时代军旅文学赓续传统、聚力强军的一次勇毅尝试与集群冲锋。

诠释历史的逻辑

丁晓原

佳作读评

品味艺境,引领审美

近读丁晓平50万字的报告文学新作《人民的胜利——新中国是这样诞生的》(江西高校出版社2021年5月),我不由沉浸在那宏大的历史叙事中。《人民的胜利》描写了一代中国人民翻身得解放倾力奉献的“人民之子”,他们气韵生动的形象跃然纸上,矗立在我们的眼前,召唤着走在新征程上的后来人砥砺前行奋进。

围绕着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党史方面的主题写作蔚然成风。丁晓平的《人民的胜利》以其对特定历史时段所做的一种“总体性写作”,显示出非虚构历史叙事的大格局、大气象以及内含其中的大主题。作品聚焦于1946年到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包括《前夜》《翻身》《决战》《统战》《外交》和《开国》6章,广泛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诸多方面,全面真实生动地揭示出了实现“人民的胜利”这一伟大事件所蕴含的历史逻辑,从而使得作品对历史现场的文学重述具有了历史哲学的意义。

要有效地再现过往时空中的重大历史事件,作者就必须能够深度抵达历史现场,再现特殊现场中的人物以

及相应的场景,并且能够从中窥见历史的气场及其精神特质。“现场感”是此类写作获得成功的基本要求。一方面,“现场感”包含着人物、事件及其存在的环境,这些构成了作品叙事的基本要素;另一方面,“现场感”有益于作品真实感和文学性的增强。“历史创造”与“创造历史”体现着深刻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作者聚焦“历史创造的现场”,在作品中呈现了一系列与此相关的或全景或特写的历史场景。

在作品的6章安排中,《开国》无疑是全篇叙事的高潮部分。其中有新政协会议筹备的种种精心而细致的现场,有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时代表讨论审议的热烈和欢欣的现场,更有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庄严宣告和人民笑逐颜开的现场。所有这些,作者都作了充满画面感和镜头化的处理,同时又通过不同方式配以历史在场者的种种“声音”,使作品的叙事具有视听效果。作品的每一个章节涉及的都是重大的历史课题,这需要作者熟悉并掌握丰富的史料。多年的主题写作,使得丁晓平对党史、革命史十分熟稔。从书中规范的标注,可以看出作者作了大量的专门性阅读,将丰富的史料熔铸于一体,使作品在呈现历史时有着特别的厚实和新意。其间,存录了许多有情有义也不乏趣味的细节,这是对历史的一种

追怀和致敬。

《人民的胜利》不仅注重对历史现场的呈现,也强化对人的精神现场的映照。无疑,作品最重要的主人公是开国领袖毛泽东,作者对毛泽东的叙事是充分的、多维立体的,最为感人心怀的是对毛泽东特有的精神气场的表现。在延安杨家岭窑洞前的苹果树下,毛泽东接受斯特朗的采访时,纵论国内外大势,“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名言表达的是理性与自信。在陕北的山沟里,“我决定和陕北百姓一起,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显示出的是镇定自若、临危不乱的精神风度。而在西柏坡这个“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彰显的则是历史创造者的雄才大略。与此相关的种种精神叙事,复现的是人物独具魅力的人格,这也是这种大历史书写中最为动人的篇章。

“历史,不仅仅是历史,而是一种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丁晓平如是说。正因为作者具有这样的认知自觉,所以《人民的胜利》揭示了“开国领袖毛泽东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诠释了历史大势与历史逻辑。人民,既是历史结构的一种伦理,也是观照历史的一种尺度。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民的胜利”“新中国的诞生”,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民观及其成功实践最为真切生动的写照。

为文学史写真存照

吴思敬

《深度对话鲁奖作家》(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10月)是记者、批评家舒晋瑜采访了49位鲁奖获奖作家和10位鲁奖评委的访谈录。该书与她此前推出的《深度对话茅奖作家》,恰成双璧,为研究获奖作家和当代文学评奖制度提供了可靠而有力的资料。

《深度对话鲁奖作家》的出版,有助于对鲁奖获奖作家的深入研究。舒晋瑜所采访的作家均是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是当代文坛的领军人物。与这样的作家对话是有难度的,更何况是深度对话。实际上,舒晋瑜对每位作家的采访都是做足了功课,有备而来。采访之前,她要熟读作品,列出采访提纲;对话开始时,她摒除了那些客套话,以及对作家作品的一般性介绍,而是直奔主题,提出的问题尖锐、深刻、泼辣,一下子把作家置于无处可退的文学现场,进而激发作家思辨的火花。在这部书中,记者与作家言来语往,舌剑唇枪,既互相理解欣赏,又充满了睿智的交锋。

在采访之后,她给每位作家都写了一篇简短的“采访手记”,像采访史铁生后所写的那段话:“看史铁生的作品,常常无端地陷入一种思索。但是,这种思索相对于文字的内涵来说也往往显得浅薄。他对于写作的宁静和执着,对于生命的冷静和超脱,对于亲情的感悟和回忆,对每一个关心他的人的友善和热情——这一切都让人觉得亲切而意味深长。”这是舒晋瑜对史铁生为人的精彩概括,也可以说是她为这位作家勾画的一幅精神素描。

为了让读者能对采访的要点与精华有更深的领悟,舒晋瑜还在每个采访

的段落前加上几句类似小标题的黑体字按语,进一步把这位作家的精神气质凸显出来。还是以对史铁生的采访为例,舒晋瑜用了如下两段话分别作为对史铁生采访内容的概括:“史铁生的写作没有计划。因为精力不济,多数是想到哪儿写到哪儿而已。”“我想对读者说的,就是我想对自己说的,都在我的作品里。”“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有一些悲观,如果陷在里面,写作就会萎缩。史铁生说,每个人都有局限,每个人都在这样的局限中试图去超越。”这两段按语,再加上舒晋瑜写的“采访手记”,似乎可以视为舒晋瑜为这位作家撰写的一个扼要的“作家论”了。舒晋瑜在作家获奖之际,第一时间写出鲜活生动的“一家之言”,在推动鲁奖作家研究方面,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深度对话鲁奖作家》的推出,有助于对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完善与改进。文学评奖制度是特定时代文学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史研究侧重在以作家、作品为核心的文本研究,相应的文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研究,比如文学制度的研究就比较薄弱。实际上文学制度既是文学生产与传播的条件,也是文学生产与传播的结果,既对文学生产制约和引导,也给予文学以体制保障。文学制度包括文学社团的组织制度、职业作家制度、报刊丛书与传播制度等,其中很重要的一块就是文学评奖制度。舒晋瑜的《深度对话鲁奖作家》与《深度对话茅奖作家》,就是对文学评奖制度的一种深入的考察与研究,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不仅对于观察那一阶段的文学史,而且对于思考未来的文学制度建设亦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长征

第5360期

古战场(中国画) 杨刚作

